臺大文史哲學報　第六十一期
2004 年 11 月　　頁 299～318
臺　灣　大　學　文　學　院

清代「後山」地理空間的論述與想像

康 培 德 *

摘　要

本文討論清代文獻有關「後山」此一地理空間的論述與想像，文章整理有關「後山」此一地名的分布，討論臺灣東部作爲「後山」時，其地理空間範圍如何呈現與變化。文章認爲在官方的文獻論述裡，「後山」除代表地方行政建置上的化外，也隱含前現代社會的文化階序；一般志書則視「後山」爲半信半疑、匪夷所思、神秘不可測的自然力歸屬地，以透過未知地理空間滿足鄉民對異象的想像。

關鍵詞：後山、地理想像、歷史地理

本文 93.2.19 收稿；93.10.20 通過刊登。

*國立花蓮師範學院鄉土文化研究所教授兼該校教務長。

The Discourse and Geographical Imagination of *hou-shan* in the Qing Period

Kang, Peter *

Abstract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discourse and geographical imagination of *hou-shan*, or the back of the mountain, in the Qing documents. It first describes th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the place called *hou-shan*, and then focuses on the changing geographies of *hou-shan* as the eastern half of Taiwan. The paper argues that the official discourse presents *hou-shan* as an uncivilized space beyond imperial administration, indicating a cultural hierarchical order in the pre-modern society. The Gazettes usually describes *hou-shan* as a place where we expect to observe unbelievable or mysterious phenomena. In other words, *hou-shan* as unknown geography greatly satisfies the folk imagination toward strangeness.

Keywords: hou-shan, geographical imagination, historical geography

* Professor of Graduate Institute of Local Studies and Dean of Academic Affairs, National Hualien Teachers College.

清代「後山」地理空間的論述與想像 *

康培德

一、前言

「後山」此一地理名詞的產生，主要來自對「前山」的對應。純就字意來看，「後山」顯然是在「山之後」；然而，在清代文獻的書寫中，「後山」具有更爲複雜的語意及內涵。去過陽明山國家公園的遊客，大多聽過前山公園、後山公園的俗稱；對熟悉語言文化的人來說，此一早存在於陽明山地區「國家公園化」前，並代表地理差異的稱謂，進一步傳達了多種隱約的含意。換句話說，「後山」一詞，不止是相對於「前山」的中性空間稱謂，似乎還帶有相對位階的差異色彩。事實上，從地理學家的眼光來看，一般指稱地理方位的「前、後」、左、右」與「東、西、南、北」，不但代表如集合符號般的中性空間稱謂，並約略具有前現代社會隱含的階序高低之別；其中，「前」意涵的正面價值，略高於「後」。[1]

回顧歷史文獻，清代臺灣對「後山」的記載，不但遍布全島，描述地點也不盡相同；其中，最直接的指涉意含爲：泛指臺灣東部，其地理範圍係以今花蓮與臺東兩縣爲主體。此一空間範圍的釐定，可上溯至一六五〇年代荷蘭東印

---

* 本文修改自發表於2003年12月4日－12月5日，佛光大學人文社會學院主辦，「歷史、空間、東台灣——從歷史社會學及全球化的角度看東臺灣的發展」學術研討會，〈當蛤仔難遇見後山——東臺灣「後山」地理範圍的變遷〉一文。本文的完成，須感研討會與會學者的建議，及匿名審查人所提供的寶貴意見。作者在此一併銘謝之。文中的漏失、誤引等，則為作者的責任。

1 陳文尚，《台灣傳統三合院式家屋的身體意象：地理知識學 (Geosophy) 例證研究之二》（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地學研究所暨地理學系，1993）。

度公司的「東部地方會議」轄區，一八八〇年代大清帝國設置的「臺東直隸州」，或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劃設的「花蓮港廳」等。[2] 不過，此一描述次數最多、涵蓋面積最大的「後山」，在文獻中的空間範圍並非一成不變，而是從抽象朝向具體，並顯現逐步縮減的趨勢。

本文即嘗試從「後山」一詞，透過清代歷史文獻的論述場域，首先整理文獻中有關「後山」此一地名的分布；並在討論臺灣東部作爲「後山」時，其地理空間範圍如何呈現與變化，「後山」論述的內涵，及其地理範圍變遷的意義。[3]

二、相對的「後山」

清代文獻，有不少關於「後山」的記載，但並不完全指同一地方；有的如字意所指，是**在地山的另一側**。當然，**另一側**的概念，指的是與文獻書寫、編纂、生產者所在處較一致的對立面；而**在地**的概念，則以文獻所欲含括的地理

2 康培德，〈從地理學的區域概念試論東臺灣的型構：以《東台灣研究》為主的討論〉，《東台灣研究》5（2000），頁 18。

3 歷史地理學有關地理空間論述的研究，如 Mark Bassin 討論十九世紀中葉俄羅斯，係如何徘徊在尼古拉一世之後的擴張主義及歐洲新興的民族主義潮流間，論述自清帝國獲得的遠東領地。Mark Bassin, Imperial Visions: Nationalist imagination and geographical expansion in the Russian Far East, 1840 – 186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Serge Courville 將十九世紀有關魁北克的殖民文宣，置於當時處於競爭中的國際關係脈絡，討論殖民地菁英份子如何形構地理空間的論述。Serge Courville, “The Colonial Dream: empire, Quebec and colonial discours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n Iain S. Black and Robin A. Butlin (eds.), Place, Culture and Identity: essays in historical geography in honour of Alan R. Baker (Québec: Les Presses de l’Université Laval, 2001), pp. 289-309；Robin A. Butlin 以十七世紀英、法學者如何透過地圖、圖刻等文獻書寫巴勒斯坦，討論如主客體關係、意識形態等議題在呈現地理空間上的複雜性。Robin A. Bultin, “A Sacred and Contested Place: English and French representations of Palestine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in Iain S. Black and Robin A. Butlin (eds.), Place, Culture and Identity: essays in historical geography in honour of Alan R. Baker (Québec: Les Presses de l’Université Laval, 2001), pp. 91-131；Brian Osborne 進而運用加拿大以地理景觀為主題的畫作，討論地景與建構國族認同間的關係。Brian S. Osborne, “The Iconography of Nationhood in Canadian Art,” in Denis Cosgrove and Stephen Daniels (eds.), The Iconography of Landscape: essays on the symbolic representation, design and use of past environmen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43-82. Brian S. Osborne, “Warscapes, Landscapes, Inscapes: France, War, and Canadian National Identity,” in Iain S. Black and Robin A. Butlin (eds.), Place, Culture and Identity: essays in historical geography in honour of Alan R. Baker (Québec: Les Presses de l’Université Laval, 2001), pp. 311-333. 本文的問題意識，即基於此一研究脈絡。

範圍爲主。這類文獻裡的「後山」，往往需要一前置地名，才能清楚其所指「另一側」的確切位置。

一七四〇年〔乾隆五年〕印行的《重修福建臺灣府志》，提到今嘉義、高雄縣交界玉案山〔今玉打山〕後的「三民火」：

> 玉案山**後山**之麓，有小山。其下水石相錯，石罅泉湧，火出水中，有焰無烟，焰發高三、四尺，晝夜不絕。置草木其上，則烟生焰烈，皆化為燼。[4]

一七四五年〔乾隆十年〕印行的《重修臺灣府志》，提到今臺中、南投縣一帶的萬斗六溪，與臺北縣的望海亭：

> 萬斗六溪：在縣治東北二十里。發源於火焰**後山**，流入貓羅溪。[5]
>
> 望海亭：在北淡水營盤**後山**之畔。都司王三元所葺。海市萬狀，悉屬望中。[6]

一七六四年〔乾隆二十九年〕印行的《續修臺灣府志》，提到今臺南縣卓猴溪：

> 卓猴溪：在縣治東三十里。發源於卓猴**後山**，合洋子港之水會於蔦松溪。[7]

一八三一年〔道光二十一年〕印行的《噶瑪蘭廳志》，提到今日宜蘭縣：

> 四圍大陂**後山**：在廳治西十一里。北連柴圍後一帶，直接五方旗山；南互枕頭山後屏與圳頭山相並。連巒岑崙，彌望青葱；中有一峰，特為角拔，所謂「西峰爽氣」，為蘭八景之一者即此。[8]

---

4 劉良璧（纂），《重修福建臺灣府志》，臺灣文獻叢刊第七四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頁 492。

5 范咸（纂），《重修臺灣府志》，臺灣文獻叢刊第一〇五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頁 25。

6 《重修臺灣府志》，頁 543。

7 余文儀（纂），《續修臺灣府志》，臺灣文獻叢刊第一二一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頁 11。

8 陳淑均（纂），《噶瑪蘭廳志》，臺灣文獻叢刊第一六〇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3），頁 11。

> 頭圍**後山**：在廳治北三十五里。連岡疊嶂，北走　　；迤西尤叢巖沓岫，綿亙磅礴。雖舊以反水為界，然盤旋紆鬱中，雲峰縹緲，烟樹迷濛，有不能辨其屬蘭、屬淡者。蓋由頭圍炮臺石空仔後過大坪可達淡之水返腳，或由萬順寮繞出艋舺街，通計不過數十里許耳。[9]

一八七〇年〔同治九年〕印行的《淡水廳志》，提到今桃園縣中壢一帶水圳時：

> 中壢為塹北、淡南適中之區，地高亢而不曠，間有小陂而瀦水甚少，半為旱田。前同知曹謹探得水源在大姑嵌**後山**之湳仔莊，蜿蜒約三十餘里；引其流以達中壢，可灌溉數千甲。計議舉行，苦於發源處生番出沒，遂中止。比來開墾日廓，生番遠匿，絕無滋擾患矣。惟大姑嵌之居民屬漳者多，而中壢又多粵人；欲引漳人之水以溉粵人之田。非民所能自辦也。所以弭衅端、拓廢土為百世無窮之利，應俟後之君子！[10]

一八九三年〔光緒十九年〕完稿的《新竹縣志初稿》，提到今新竹縣的義塚時：

> 后莊崎頭山塚：在中港**後山**後，距竹城二十一里。嘉慶年間獻。[11]

上舉這類「後山」例證，幾乎遍布全島；指涉的地方，需依附前置地名，始能大略判斷方位。所以，此「後山」一詞，並未指稱特別的地理象徵意義。圖一爲相對的「後山」範圍圖。

三、中央山地與「後山」

在關於「後山」的稱謂中，歷史文獻出現最頻繁、地理面積最大的，則是指涉包含中央山地及其以東地區等未知空間的「後山」，其範圍邊界相當模糊。

《重修臺灣府志》《重修福建臺灣府志》《續修臺灣府志》《重修鳳山縣

9 《噶瑪蘭廳志》，頁 12。

10 陳培桂（纂）《淡水廳志》，臺灣文獻叢刊第一七二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3），頁 80-81。

11 鄭鵬雲（纂），《新竹縣志初稿》，臺灣文獻叢刊第六一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9），頁 38。

志》等誌書在描述一七二八年〔雍正六年〕隘寮溪的山豬毛社〔今山地門〕事件時，提到清軍於翌年圍堵「後山」，調內優社截擊山豬毛社；此處的「後山」，其實是今高雄、屏東兩縣山區，範圍屬中央山脈。

> 傀儡生番性嗜殺人，取其頭以多者為雄；諸社皆然，而山豬毛為最。雍正六年冬十二月二十四日，殺漢民二十二人。次年春二月，總督高其倬檄臺道孫國璽、臺鎮王郡調遊擊靳光瀚、同知劉浴帶兵攻山豬毛社；調諸羅縣知縣劉良璧堵**後山**，撥內優社番擊八里斗難截殺之。又檄北路參將何勉入南仔仙山，會同抵邦尉山下，相機擒勦。山豬毛平。[12]

類似案例，也出現在《福建通志臺灣府》對黃斗乃事件的描述。一八二六年〔道光六年〕，南庄發生黃斗乃事件，清軍分路偵擊。據載，黃斗乃等與所屬原住民曾逃往「後山」，這裡所說的「後山」約爲今新竹、苗栗兩縣山區，也在中央山地。

> 黃斗乃、黃武二、鄒阿壬、徐阿來、溫阿磐等盤踞三灣，為著名番割，往往散髮改裝，帶引生番，潛出劫掠。爾準密授機宜，令總兵陳化成、遊擊謝朝恩、謝建雍等分路而入。匪徒竄匿**後山**，峭壁懸崖，趾不容寸。將領等攀葛附籐而上，生擒黃斗乃、黃武二等二十餘人，置之法。臺人大快。[13]

這些「後山」已不同於需前置地名、以判斷所在地的「後山」，而藉由中央山地，約略觸及那片當時不爲漢人書寫者熟悉，且內涵、邊界仍在頻頻變動的東部。

事實上，具有明確地理界定的「後山」，應該是來自地圖的概括描繪。一八八八年〔光緒十四年〕的《臺灣地輿全圖》「臺灣前後山總圖說略」即將全島一分爲二，西半爲「前山」，東半爲「後山」，兩地之間，北以臺北、宜蘭間的草嶺，南以鵝鑾鼻爲界。換句話說，「後山」係以今宜蘭、花蓮、臺東三縣爲主體，再附加屏東縣牡丹鄉、滿州鄉、恆春鎮等濱臨太平洋的鄉鎮。

---

12 《重修臺灣府志》，頁 559-560；《重修福建臺灣府志》，頁 478；《續修臺灣府志》，頁 661-662；王瑛曾（纂），《重修鳳山縣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頁 278。

13 佚名（編），《福建通志臺灣府》，臺灣文獻叢刊第八四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860），頁 1034。

> 計前山自極北之基隆、宜蘭交界草嶺頂起，至極南之恆春縣轄鵝鑾鼻海口止：共計民站八百五十里。其**後山**南自鵝鑾鼻起，至宜蘭極北與基隆交界之草嶺頂止：共計七百六十里。統計前後、南北，周圍一千六百餘里。[14]

此時，清廷已在今花、東兩縣的地理空間上設置臺東直隸州。[15] 我們因此可以由上文明確區別：此時的「後山」，係大於花東兩縣的「臺東直隸州」。

同時，眼明的讀者很快就察覺：「臺灣前後山總圖說略」此一包含宜蘭縣與屏東縣一角的「後山」，係將臺灣以南北軸約略切爲東、西兩半的結果，不是東、南、西、北的四角對稱劃分。我們因此可以提問：歷史文獻在當時如何呈現「後山」的地理範圍？這些不在今花蓮、臺東兩縣、卻在歷史文獻敘述中轄屬「後山」的地方，屬性又是如何？

四、蛤仔難、恆春與「後山」

一八一三年〔嘉慶十八年〕，楊廷理針對今宜蘭縣將納爲清帝國地方行政單位乙事，留有「議開臺灣後山噶瑪蘭即蛤仔難」一文。從標題看，此時稱噶瑪蘭或蛤仔難的宜蘭縣，仍被視爲「後山」的一部份；可惜的是，無論《噶瑪蘭廳志》或《噶瑪蘭志略》的全文節略，內文均不再有任何字句提及「後山」與蛤仔難的關係。[16]

一八二四、二五年〔道光四、五年〕間任臺灣知府的方傳穟，在針對是否開墾埔裏的「開埔裏社議」文中，曾略爲提及噶瑪蘭的「後山」定位：

> 四曰定疆域：埔社東北沿山一帶各社，即非埔社之地。而內哄、赤崁之內山中，荒埔是否一并開墾；抑或以山為界？其山後東北，遙通噶瑪蘭，東南則奇來、秀姑蘭（按奇來、秀姑蘭皆在埔社東北，其東南則為卑南覓一帶地方），鳥道曲逕，蓋不甚遠。一經開墾，難保

14 不著撰，《臺灣地輿全圖》，臺灣文獻叢刊第一八五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銀行研究室，1963），頁 4-5。

15 「臺東州，係後山新闢。光緒初年，移臺防同知於埤南。逮十四年分省，裁同知，改為臺東直隸州；奏駐水尾地方，居埤南、花蓮港之中，並於埤南添設州同、花蓮港添設州判。因水尾州城未建，知州暫駐埤南，州同、州判尚無專員。」見《臺灣地輿全圖》，頁 74。

16 《噶瑪蘭廳志》，頁 365-370；柯培元，《噶瑪蘭志略》，臺灣文獻叢刊第九二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頁 173-179。

> 無民人透越潛通。即使埔社之人，毋庸更入**後山**，而山後噶瑪蘭之人，向苦由三貂轉出山前，路程險遠；今埔社既開，勢必由山後透越而至。此中界址，作何開閉？畫疆定域，必使民便，而番不病。其要四也。[17]

一八三一年〔道光十一年〕印行的《噶瑪蘭廳志》，在前噶瑪蘭通判陳盛韶的序言裡，亦提到噶瑪蘭爲「後山」的一部份：

> 噶瑪蘭故余初遷地，以檄署鹿津，頻年疏滯、運釐、屯莊，不遑一至為可歉；而每讀姚廉訪「東槎紀略」、前太守楊雙梧「開蘭節略」諸篇，皆以過化之區垂為憲履，則風土人情已得八、九。至烏筠林刺史復有八景諸題，標新名勝，可知蘭為臺**後山**一大奧區也。[18]

我們也可以將一 八三七年〔道光十七 年〕印行的《噶瑪蘭志略 》「藝文志」中，有關「蛤仔難紀略」的圖說，視爲蛤仔難的「後山」論述：

> 在最初者，有諸羅志之圖，固甚略矣。然而港汕之說已具，如彎環者全體已得；以**後山**為黑沙晃，惟諸羅志能言之。且其圖北連三貂，南接崇爻，則全寫臺灣**後山**，而悉得其意者，誠古圖也。其後徐司馬夢麟圖，則由傳聞而寫其彷彿者，故三港失其形勢，且圖玉山於蛤仔難之西北，為不能無訛。蕭竹甚悉於蛤仔難，乃其為圖，則專寫四圍；以其時竹為吳沙卜四圍地，特誇其妙，故為圖坐乾向巽，其言後山之疊脈，水法之迴抱，雖於山川之向背特詳要，皆為四圍言之，僅可稱四圍圖，而不可以蛤仔難名之也。若其形體之大備，東、西勢之分屬，民番之錯處，莊社、田園、道途、里至畢具，則惟楊太守之圖為得其詳焉。今臺所盛稱者，惟蕭竹一圖，以竹狎於蛤仔難而圖復巧妙，而眾信之也。乃古圖與楊太守圖皆背西面東，視竹之圖方向大異，故觀者炫惑莫知所從。不知背西面東者貌其全體，而竹之圖獨寫一方也。[19]

歷史文獻裡的蛤仔難「後山」屬性，似乎僅止於此。日後歷史文獻對「後

17 周璽（纂），彰化縣志》，臺灣文獻叢刊第一五六種 （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頁 409。

18 《噶瑪蘭廳志》，頁 3。

19 《噶瑪蘭志略》，頁 168。

山」地理空間的說法，似乎從此將蛤仔難排除在外。蛤仔難自「後山」除名，與其升格爲噶瑪蘭廳，可能不無關係。

一八七五年〔光緒元年〕立縣的恒春縣，也有類似情形。恒春縣，北以加爾崙溪〔今屏東縣牡丹鄉里仁溪〕與臺東埤南交界，西北以率芒溪〔今流貫屏東縣春日、枋寮、枋山鄉的士文溪〕與鳳山枋寮交界；轄境部份地區，係「臺灣前後山總圖說略」筆下的「後山」。一八九二年〔光緒十八年〕完稿的《恒春縣志》，談到境內學校文武學額應如何分配時，提及恒春縣原係「後山」之一部：

> 恆春縣係後山新闢，文童無多，仍附鳳山縣考試。現尚未設學校，核與請設定額，歷辦成案不符；該撫所請於臺南府學額內，增撥澎湖廳進額二名、恆春縣進額一名之處，應毋庸議。[20]

值得注意的是，上例恆春縣的「後山」屬性，除了是時態的過去式外，作者對恆春縣與「後山」關係的強調，似乎是爲了突顯其學校教育落後，以爭取學額的分配。換句話說，在此一脈絡中，「後山」意指清帝國轄下文教程度的相對落後。恆春縣的立縣，代表已逐漸脫離原有的「後山」屬性；此即蛤仔難設噶瑪蘭廳後，會逐漸自「後山」論述消失之因。[21]

五、晚清「後山」的地理範圍

當蛤仔難設廳、恆春設縣之後，清代末年的「後山」主體，終於逐漸聚焦到今花、東兩縣的地理空間了。

劉銘傳針對臺灣建省，曾對全臺各處地理形勢與官方行政統轄配置表達看法；其中，關於「後山」部份，提到：

> **後山**形勢，**北以蘇澳為總隘，南以埤南為要區，控扼中權，厥惟水尾**。其地與雲林縣東西相值，已自丹社集集街達彰化，闢路百八十

20 屠繼善，《恒春縣志》，臺灣文獻叢刊第七五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頁 226-227。

21 有關蛤仔難改制為噶瑪蘭廳時，官方係如何透過地景詮釋、風水論述等方式，尋求蛤仔難地理空間內部的社會文化秩序，以擺脫原有的化外屬性，請參考林開世的討論。Lin Kai-shyh, “The Frontier Expansion of the Qing Empire: the case of Kavalan subprefecture in nineteenth-century Taiwan,” (Ph. D.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99).

> 里貫山中。省城既定，中權前後，脈絡貫通。水尾實臺東鎖鑰，設臺東直隸州駐之，左界宜蘭，右界恆春，地縱五百里，橫三、四十里，通隸此州而屬諸臺道。埤南廳舊治，設直州同治之。水尾迤北曰花蓮港，新墾既多，海口水深數丈，設直州判駐之，而均隸臺東州。此後山也。詔從之。[22]

在官方論述裡，晚清「後山」的地理範圍，係南以埤南爲要地，但實抵恆春縣界，約與今臺東縣南緣相當；北則與已於一八七五年〔光緒元年〕改制宜蘭縣的噶瑪蘭廳爲界，但仍包括蘇澳。換言之，此時的「後山」概念，係指不屬清帝國行政轄境外，但適宜開墾、也有人民進墾，或掌握出入險要之處。

此一臺灣建省〔一八八五年，光緒十一年〕後、劉銘傳筆下的「後山」地理範圍，其實早在一八七四年〔同治十三年〕牡丹社事件後、清帝國實施「開山撫番」時，針對今花、東兩縣境的軍事行動論述中，即已彰顯。一八七七年〔光緒三年〕，時任福建巡撫的丁日昌，在其針對臺灣「後山」防務上奏的「籌商大員移紮臺灣後山疏」裡，提及：

> ・・・**後山北路**除蘇澳至新城，約一百六七十里，崇山峻嶺，偪近生番。上年勉強開路，終屬艱險難行，而且無田可墾，無礦可開，我既味同嚼蠟，則彼族亦斷不垂涎，可想而知。自新城起至大巴隴止，約一百里，是為**北路之岐萊**；自大巴隴起至成廣澳止，約一百餘里，是為**中路之秀孤巒**；自成廣澳起至阿郎臺止，約一百餘里，是為**南路之卑南**；計共袤長約有三四百里，廣則有四五十里或千餘里不等。[23]

> ・・・至**蘇澳為後山北路門戶**，設有統領，前此提督羅大春、彭楚漢，皆以病去，總兵宋桂芳，因病身故，見在總兵張陞楷，亦因病請假。茲蘇澳以下各營，既經騰挪移紮，新城至卑南一帶，歸吳光亮調遣，則蘇澳自可不設統領，擬仍紮一營，就近歸駐紮雞籠之總兵孫開華調度，俾有稟承。所有籌商大員移紮後山，以靈呼應而求實濟緣

22 劉銘傳，《劉壯肅公奏議》，臺灣文獻叢刊第二七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8），頁 28。

23 諸家，《道咸同光四朝奏議選輯》，臺灣文獻叢刊第二八八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71），頁 87。

由，謹會同督臣何璟恭摺密陳，伏乞聖鑒訓示。[24]

在此，「後山」係以北路、中路、南路三個軍事區塊，界定範圍：北路係以蘇澳爲門戶，但又依原住民勢力、地形等實際狀態，將今日太魯閣口以北之處淡化，僅強調太魯閣口以南至今花蓮縣光復鄉一帶，稱**北路之岐萊**；中路則爲光復鄉至今臺東縣成功鎮一帶，稱**中路之秀孤巒**；南路爲成功鎮至今臺東縣達仁鄉安朔溪，稱**南路之卑南**。丁日昌筆下的「後山」北路，除了在文字敘述中隱約淡化蘇澳至太魯閣口一段；在涉及實際的部隊指揮調度時，蘇澳在「後山」北路的軍事區塊劃歸裡，已名存實亡。

到了一八八七年〔光緒十三年〕，劉銘傳的「各路生番歸化請獎員紳摺」、奏臺灣各路生番歸化並開山招撫情形疏」，或《光緒朝東華續錄選輯》收錄的劉銘傳奏書資料，對「後山」、後山」北路的說法係大同小異，以前者爲例：[25]

> 竊臣於光緒十二年夏秋勦撫南北社番，先後奏明在案。旋據署臺灣道陳鳴志、副將張兆連稟稱：**後山**番社，未撫尚多，跧伏萬山之中，北抵蘇澳、歧萊，南至卑南、恆春，綿亙數百里。若由後山水尾適中之地，與前山彰化，除道成梁，聲氣聯絡，先撫**後山**中路，其餘當聞風向化，無俟招徠；否則，招撫雖多，聲氣終隔，勞費雖重，馴服仍艱。當檄署臺灣鎮總兵章高元，統帶礮軍練勇民夫，自彰化集集街鑿山而東，張兆連自水尾鑿山而西，兩面刻期並開孔道。章高元率勇自拔埔社開至丹社嶺，造路一百二十二里；張兆連自水尾開至丹社嶺，造路六十里；均係崇山峻嶺，峭壁深谿。該鎮等自冬至春，鑿崖伐木，一律告竣。張兆連開山時，軍聲震岩谷，諸番社已憚威懾服；因命營官黃定國先撫水尾南北川丁仔老等二十四社，番丁四千餘人悉薙髮歸化，就立社長以鈐束之，頒發憲書，設立條教，使奉正朔。次由花蓮港至歧萊，沿山一帶他良等十二社，番丁二千餘人，亦悉招撫。諸番既定，僅有毘連歧萊之大魯閣、木瓜諸社番，恃眾抗

24 《道咸同光四朝奏議選輯》，頁 88。

25 後二例證，請參考《劉銘傳撫臺前後檔案》與《光緒朝東華續錄選輯》。見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劉銘傳撫臺前後檔案》，臺灣文獻叢刊第二七六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9），頁 265-266；朱壽朋（纂），光緒朝東華續錄選輯》，臺灣文獻叢刊第二七七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9），頁 136-137。

> 拒。張兆連因大魯閣社為北路最強之番，若能懾服，則鄰社自易招撫；乃親帥三營駐紮山口，聲言開礮攻勦，該社長廉畫溢等果大懼乞降。鄰近大馬鞍、大吧壟等五十三社，亦均乞降薙髮。共得眾一萬五千餘人。此**後山北路**由水尾至花蓮港諸番歸化之情形也。[26]

劉銘傳此時已是晚清末期的說法，雖將「後山」地理範圍北界再拓至**蘇澳**，卻是對比於南界的**恆春**；若是對比南端的**卑南**，則應爲文中的**岐萊**較恰當。值得注意的是，文中「後山」地理範圍的外拓，係針對駐地軍隊與當地原住民間的互動關係。「後山」北路提到的原住民村社，以今花蓮縣光復鄉的馬太鞍〔大馬鞍〕與太巴塱〔大吧壟〕、吉安鄉的荳蘭社群〔他良〕、秀林鄉木瓜溪流域的木瓜社群、秀林鄉立霧溪流域的太魯閣族爲主。這些原住民的活動範圍，與駐地清軍勢力交疊之處，係之前丁日昌所謂的**北路之岐萊**。至於當時宜蘭縣蘇澳駐地清軍面臨的泰雅族溪頭群、南澳群，則不包含在此一「後山」論述。換句話說，一八八七年〔光緒十三年〕丁日昌、劉銘傳等對「後山」地理範圍的理解，大體已是晚清時期官方文獻對「後山」的定型說法。圖二爲「後山」範圍具體化的趨勢圖。

六、「後山」的意象

如果官方志書裡的「後山」屬性，是透過時態的過去式，呈現清帝國轄下文教程度的相對落後與地方行政在建置上的化外；「後山」在志書中的一般意象，又是如何？

一八七一年〔同治十年〕，《東瀛識略》「卷七：奇異」部份收有與臺灣相關的**異象**；其中，部份與大自然現象有關，如落山風、燃燒的天然油氣、海潮漲退、壁虎鳴聲、毛蟹等，部份則爲地方人文特色，像日月潭原住民的「浮田」、以曬乾牛糞爲燃料的「牛柴」等。這些作者筆下的現象，大多僅止於描述，並未對現象來龍去脈進行解釋，也不見現象在地理差異上的對比。不過，其中與「後山」有關者，倒是有所不同：

> 相傳臺鹿皆鯊魚所化，然沿海俱有鯊，即臺地山前亦有之，未見有化鹿事。獨**後山**鯊魚隨潮登岸，即化為鹿，毛色純黃，其孳生

26 《劉壯肅公奏議》，頁 217-218。

者，始有梅花點。[27]

鯊魚變爲鹿的說法，係始於《小琉球漫誌》轉載《嶺南雜記》的「鯊魚之虎頭者化爲虎、斑者化爲鹿」一說。[28] 其後，《淡水廳志》、《恒春縣志》等論及「物產」時，亦依循相關說法，認爲沿海地區的鹿——特別是有花毛的梅花鹿，是鯊魚的化身。[29] 文獻雖然提及臺灣四周沿海鯊魚出沒，但《東瀛識略》不認爲「前山」會發生鯊魚變鹿之事，而認定此**異象**僅止於「後山」，換句話說，漢人蹤跡稀少的「後山」，已成爲書寫者投射半信半疑、甚至匪夷所思想像的對象。

一八九八年〔明治三十一年〕《樹杞林志》的「祥異考」部份，亦有對「後山」的揣摩猜測：

> 光緒十五年，有旋風自銅鑼圈起，在空中結成黑霧，飛捲之勢甚猛，聲響似沉雷。盤流至鹿寮坑尾樟樹凹，有古樟一株大十圍、高六七丈，忽然為黑霧捲去不知所之，後聞說落在**後山**基來社。[30]

文中的基來社，指的是今花蓮市一帶的 Sakiraya 社——即文獻中慣稱的筠椰椰、根老爺或巾老耶。[31] 透過具歷史意味的古木與人力無法抗衡的龍捲風二個代表大自然力量的結合，「後山」反映的地理意象，實爲一神秘且不可測的自然力歸屬地。

七、小結與討論

綜觀清代臺灣歷史文獻上的「後山」，不但語意多重，指涉空間亦幾乎遍及全島。有無法單獨標示所在，需依附前置地名的「後山」，更有深入中央山

27 丁紹儀（纂），《東瀛識略》，臺灣文獻叢刊第二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7），頁 84。相同敘述，亦轉載於 1895 年的《臺灣通志》「物產・蟲魚類・鱗介之屬・附考」。見薛紹元（纂），《臺灣通志》（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頁 214。

28 朱仕玠，《小琉球漫誌》，臺灣文獻叢刊第三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7），頁 93。

29 《恒春縣志》，頁 162；《淡水廳志》，頁 330。

30 林百川、林學源（纂），《樹杞林志》，臺灣文獻叢刊第六三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頁 114。

31 康培德，《殖民接觸與帝國邊陲——花蓮地區原住民十七至十九世紀的歷史變遷》（臺北：稻鄉，1999，）頁 44-45, 138-139, 141。

地，甚至幾乎等同於今日東 臺灣的「後山」。同時，所謂「後山」的地理範圍，並隨歷史演變，呈現縮減與具體化的趨勢。

若以清代地圖與說明文字爲參考基準，「後山」是將臺灣約略以南北軸切爲東、西兩半後，取其東半部的結果。此一意義下的「後山」，北起宜蘭與基隆交界之草嶺，南抵鵝鑾鼻——即以今宜蘭、花蓮、臺東三縣爲主體，附加屏東縣牡丹鄉、滿州鄉及恆春鎮之一部份。

一八三〇年代〔道光朝〕以前，「後山」仍包含當時又稱「蛤仔難」的蘭陽平原；但一八一二年〔嘉慶十七年〕編入清帝國、成立噶瑪蘭廳後，蛤仔難即已逐漸自「後山」論述消退。至於牡丹鄉等地，則在一八七五年〔光緒元年〕新立恒春縣以後，開始自後山排除。行政區的建立，使「後山」的北界、南界產生變動，逐漸脫離「後山」屬性——即帝國轄下教化程度的相對落後。換句話說，在官方的文獻論述裡，「後山」除代表地方行政建置上的化外，也隱含前現代社會的文化階序。

一八七四年〔同治十三年〕牡丹社事件後，清帝國實施「開山撫番」政策，「後山」論述更顯明確。晚清的「後山」，名義上雖然包括今宜蘭縣蘇澳，並視其爲門戶；但，不論是文字敘述或實際軍事行政運作，「後山」論述中的蘇澳已淡化處理，甚至名存實亡。東臺灣作爲「後山」的實質空間，依駐地軍隊與原住民互動關係的脈絡，地理範圍已縮減至今花蓮、臺東兩縣。然而，一般志書對異象的描述，仍與「後山」多有關聯；不是半信半疑、匪夷所思，就是視爲神秘不可測的自然力歸屬地。

清代有關臺灣的遊記，於公，提供帝國對邊疆的地理知識；於私，則爲作者個人旨趣的表達。同時，在「志怪」書寫傳統的影響下，與漢人差異極大的原住民，往往成爲文獻的主要敘述對象。[32] 換句話說，「後山」作爲一地理空間，清代志書等官方論述不但含有文化階序高低之別，更有將「漢／非漢」以文明指標對比的暗示。[33] 至於一般的意象記載，「後山」往往成爲投射所在；藉由對未知地理空間的描繪，滿足鄉民對異象的想像。[34]

---

32 Emma Jinhua Teng, “Travel Writing and Colonial Collecting: Chinese travel accounts of Taiwan from the seventeenth through Nineteenth Centuries,” (Ph. D.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Civiliz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1997), pp. 392-399.

33 陳明仁，〈東臺灣歷史再現中的族群與異己——以胡傳之《臺東州采訪冊》的原住民書寫為例〉（國立花蓮師範學院鄉土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

34 此即 Henri Lefebvre 所談地理空間係社會形塑之結果，而不同的社會文化秩序，則

各有不同的空間型構 。見 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Oxford: Blackwell,1991), pp. 26-33.

引用書目

丁紹儀（纂），《東瀛識略》，臺灣文獻叢刊第二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7（1871）。

不著撰，《臺灣地輿全圖》，臺灣文獻叢刊第一八五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銀行研究室，1963（1888）。

王瑛曾（纂），《重修鳳山縣志》。臺北：臺灣銀行 經濟研究室，1962（1764）。

朱仕玠，《小琉球漫誌》，臺灣文獻叢刊第三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7（1766）。

朱壽朋（纂），《光緒朝東華續錄選輯》，臺灣文獻叢刊第二七七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9。

佚　名（編），《福建通志臺灣府》，臺灣文獻叢刊第八四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860。

余文儀（纂），《續修臺灣府志》，臺灣文獻叢刊第一二一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1764）。

周　璽（纂），《彰化縣志》，臺灣文獻叢刊第一五六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1830）。

林百川、林學源（纂），《樹杞林志》，臺灣文獻叢刊第六三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1898）。

柯培元，《噶瑪蘭志略》，臺灣文獻叢刊第九二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1837）。

范　咸（纂），《重修臺灣府志》，臺灣文獻叢刊第一〇五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1745）。

康培德，《植民接觸與帝國邊陲——花蓮地區原住民十七至十九世紀的歷史變遷》。臺北：稻鄉出版社，1999。

---，〈從地理學的區域概念試論東臺灣的型構：以《東台灣研究》為主的討論〉，《東台灣研究》5：17-33，2000。

陳文尚，《台灣傳統三合院式家屋的身體意象：地理知識學 (Geosophy) 例證研究之二》。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地學研究所暨地理學系，1993。

陳明仁，〈東臺灣歷史再現中的族群與異己——以胡傳之《臺東州采訪冊》的原住民書寫為例〉。國立花蓮師範學院鄉土文化研究所碩士

論文，2002。

陳培桂（纂）《淡水廳志》，臺灣文獻叢刊第一七二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3（1870）。

陳淑均（纂），噶瑪蘭廳志》，臺灣文獻叢刊第一六〇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3（1831）。

屠繼善，《恒春縣志》，臺灣文獻叢刊第七五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1892）。

劉良璧（纂），《重修福建臺灣府志》，臺灣文獻叢刊第七四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1740）。

劉銘傳，《劉壯肅公奏議》，臺灣文獻叢刊第二七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8。

鄭鵬雲（纂），新竹縣志初稿》，臺灣文獻叢刊第六一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9（1893）。

薛紹元（纂），《臺灣通志》。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1895）。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劉銘傳撫臺前後檔案》，臺灣文獻叢刊第二七六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9。

諸　家，《道咸同光四朝奏議選輯》，臺灣文獻叢刊第二八八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71。

Bassin, Mark, *Imperial Visions: Nationalist imagination and geographical expansion in the Russian Far East, 1840 – 186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Butlin, Robin A., “A Sacred and Contested Place: English and French representations of Palestine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in Iain S. Black and Robin A. Butlin (eds.), *Place, Culture and Identity: essays in historical geography in honour of Alan R. Baker*. Québec: Les Presses de l’Université Laval, pp. 91-131, 2001.

Courville, Serge, “The Colonial Dream: empire, Quebec and colonial discours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n Iain S. Black and Robin A. Butlin (eds.), *Place, Culture and Identity: essays in historical geography in honour of Alan R. Baker*. Québec: Les Presses de l’Université Laval, pp. 289-309, 2001.

Lefebvre, Henri,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Oxford: Blackwell, 1991.

Lin Kai-shyh, “The Frontier Expansion of the Qing Empire: the case of Kavalan subprefecture in nineteenth-century Taiwan,” Ph. D.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99.

Osborne, Brian S., “The Iconography of Nationhood in Canadian Art,” in Denis Cosgrove and Stephen Daniels (eds.), *The Iconography of Landscape: essays on the symbolic representation, design and use of past environmen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43-82, 1988.

---, “Warscapes, Landscapes, Inscapes: France, War, and Canadian National Identity,” in Iain S. Black and Robin A. Butlin (eds.), *Place, Culture and Identity: essays in historical geography in honour of Alan R. Baker*. Québec: Les Presses de l’Université Laval, pp. 311-333, 2001.

Teng, Emma Jinhua, “Travel Writing and Colonial Collecting: Chinese travel accounts of Taiwan from the seventeenth through Nineteenth Centuries,” Ph. D.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Civiliz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1997.